

商票

兴衰史

中国经济出版社

票商兴衰史

史若民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票商兴衰史/史若民著. —2 版.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4 重印

ISBN 7-5017-1906-3

I. 票… II. 史… III. 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IV
. 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633 号

责任编辑: 王连英

封面设计: 侯 茗

票商兴衰史

史若民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2.5 印张 31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2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300—7300 册

*

ISBN 7-5017-1906-3/F·1279

定价: 27.00 元

序

票号是 19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金融组织。票号商帮则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大商埠非常活跃的金融势力。他们既为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度时期也为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效过力。19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票商在挽回国家利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做过很大的努力。人们通常说的票号“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同时，他们在从事汇兑的过程中，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此，自票号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大约从 1905 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撰文著述，对票号的起源、发展、业务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开始进行研究。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过《山西票庄考略》、《山西票号史》等专著，限于时代、环境等原因，上述著作，前者过简，后者则是票号资料（包括票号遗存的帐簿、书信、票号中人的回忆录等）的汇集。许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史若民同志近著《票商兴衰史》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第一，在票号起源方面，作者把它放在明清以来广阔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中予以考查，结合建国以来整理的有关文献以及近年来发现的清初会票实物，说明专营汇兑的票号出现前，南北各大商帮都在寻找商业活动中频繁的银两转输和异地结算的简便办法，各地商人比较普遍地有在熟人、乡里、亲戚、朋友之间使用会票汇兑银两的现象。这就为专业汇兑的票号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一定程度的必然

672 64/06

产物，不像以往传说中那种有关票号的产生似乎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甚至是一种偶然事件之后，从空而降的金融怪物了。

第二，作者通过对各大商埠口岸的票号在各个时期的业务内容、服务对象、获利途径的考察，认为早在清政府引进西方方式建立中国通商银行之前，票号就已经承担了本属于应当由近代银行承担的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因而提出了19世纪20年代新出现的专营汇兑的票号不应视为封建高利贷金融组织，而应当看作是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银行业。

第三，对票号衰落的原因、历史地位和作用，依据新发现的史料作了分析，尤其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票商在资产阶级掀起的爱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资本转变的趋向与表现出来的民族资本的性格的论述，则是以往著作中所未能论及的。

尽管作者在本书中所论述的一些看法，我并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是作者能够多角度地对票号的业务活动、服务对象、组织管理、资本转变等方面进行考察，无疑对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票号是有益的，对我们承继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从中吸取教益也是有好处的。

乔志强

于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2年8月

前 言

我之所以要写票商史，即是出于一种求知的欲望，也是由于对票商的好奇，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对有过贡献的，而又由于某种原因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历史人物的纪念。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历代王朝为了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基本上都采取了一种崇本抑末的政策。他们把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按行业排队，概括起来叫做“士农工商”。其中，除“士”属于统治阶级成员的预备人员外，劳动者当中的“农工商”的劳作则被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称作“本务”，是指农；一部分叫做“末务”，是指工商。所谓崇本抑末，简单地说，就是提倡和奖励农业劳动者，抑制工商业者。其中的“商”较之“工”更在抑制之列。这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不为统治集团所重视，且时时受到抑制的工商业者——平遥颜料商人雷履泰，居然能在19世纪20年代，研究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形势及情况后，创立一种新的行业，即专营汇兑的金融业——票号（亦称汇兑庄、票庄、官方文书中又将其称为号商）。它利用一纸汇票，调动全国各地城镇、商埠码头的银两，使其迅速、安全、可靠地为频繁的商品交流服务，尤其是在各地银两成色复杂、度量衡又极不统一的情况下，使各地的商业贸易、货币清偿能够实现公平交易，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民自己创办的不称之为银行的近代银行业。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金融业的发展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光辉灿烂思想和天才的创造力。

另外，雷履泰等人创造的业绩还向人们表明，人才是致富的

最根本因素。我国有句俗语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话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是自然经济的反映，用它来指导致富，终归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培养出类拔萃、具有开拓性的人才，其致富之源则是无限的。山西在明清以来所以被人们誉为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其原因既不是靠盐铁资源，也不是由于它拥有丰富的地下煤炭。实实在在地说，是由于这块黄土地上成长和培育出一批像王现、雷履泰等讲信誉、有才干的工商业者。

我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从事票商史的研究和写作的。然而要对这种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及其事业，既他所开创的票号行业进行研究，并不是想到了，就能够做得到的，也不是做起来，就可以做得好的。

说起来，我的这个念头早在 60 年代就萌生了。但是，不久即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刚刚萌生的这一念头，不得不搁置起来，连续两年的“四清”还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飚突起，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运动的声浪渐次低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才有可能重温旧梦，希图在其本业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做出贡献。本书得以完成，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安静的能够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的环境。同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本课题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1989 年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然而由于自己理论修养、业务能力以及写作水平都不高，因此，书中的错误与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恳切地希望专家及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作者 史若民

1992 年 2 月 22 日于山西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乔志强 (1)
前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山西票号的诞生	(3)
一、票号诞生前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3)
明清两代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	
生产的政策措施	(3)
票号诞生前矿业与手工业生产发展情况	(7)
家庭手工业产品的商品率明显提高	(10)
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	(14)
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	(18)
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活跃	(20)
城镇的发达与繁荣	(22)
镖局与民信局	(25)
二、票号诞生前的国内金融业	(28)
典当业	(29)
印局	(30)
钱铺与银号	(30)
帐局	(33)
三、票号诞生前的山西商帮与商业资本	(40)
雄厚的商业资本与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	(40)
声名卓著的商业信誉	(51)
山西商人对商业人才的培养	(52)

四、票号诞生前会票的使用	(53)
从“飞钱”到会票	(54)
汇兑制度的发展	(56)
银色与本平制度	(71)
五、山西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	(75)
山西票号起源的种种传说	(75)
西裕成颜料庄	(75)
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票号	(76)
创立日升昌票号的三经理	(79)
日升昌票号的影响	(81)
第二章 票号的组织与初期业务	(88)
一、票号的组织管理	(88)
票号的创立	(89)
票号的资本组织	(90)
票号的分号设立	(91)
票号的人员组织	(91)
票号总号与分号之间的关系	(93)
总经理与股东	(94)
票号的红利分配	(95)
职员的待遇与管理	(97)
二、票号初期的业务	(101)
初期的汇兑方式及其有关规定	(101)
票号经营存放款业务	(109)
初期票号的汇兑地域	(112)
初期票号服务的主要对象	(116)
初期票号获利的主要途径	(130)
汇差结算	(140)
票号的报告制度	(144)

三、社会舆论对票号的反映·····	(146)
四、国内战争对票号业务发展的影响·····	(149)
第三章 洋务运动中票号业务的变化与发展·····	(159)
一、战争震荡后的国内形势·····	(159)
二、票号移往上海及与钱庄、洋行的关系·····	(163)
三、清政府从坚持京饷装鞘上解到觅商汇兑·····	(167)
四、官僚投资票号与南帮票号的兴起·····	(171)
五、票号承汇京、协各饷概况·····	(176)
承汇京饷·····	(176)
承汇协饷·····	(179)
票号承汇官款的手续与汇兑期限·····	(180)
票号承汇公款中的垫汇问题·····	(182)
六、电报局的成立与票号经营电汇·····	(189)
七、票号对晚清商业贸易发展的促进·····	(194)
八、汇兑公私款项的汇水与垫汇之利率·····	(215)
汇水变化与汇兑行市·····	(215)
对清政府贷放款项的利率·····	(232)
九、票号资本开始向近代工业方面倾斜·····	(235)
第四章 爱国运动中的票号·····	(243)
一、资产阶级掀起的爱国运动、实业救国热潮	
促进了票号的繁荣·····	(246)
票号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繁荣·····	(247)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票号的繁荣·····	(250)
十四个通商口岸的金融流通都为票号所左右·····	(254)
从商号亏倒票号资本，看这一时期票号与	
工商业的关系·····	(260)
众多的票号与商号的商务纠纷，是这一时期票号随	
着工商业的发展而繁荣的反映·····	(262)

二、票号与近代工业·····	(266)
争矿运动中打头阵·····	(270)
创办保晋公司·····	(278)
成立省城同蒲铁路有限公司·····	(282)
贷款给新式企业·····	(284)
为维护利权, 首先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	(286)
第五章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与票号的危机·····	(291)
一、在中国遍设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 成为 票号发展与存在的死敌·····	(291)
八、九十年代的金融风潮与丝、茶贸易·····	(293)
八、九十年代金融风潮对票号的打击·····	(299)
20 世纪初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对票号的 打击·····	(301)
二、封建政权及其附属机构官银钱局号 对票号的压迫·····	(307)
三、钱庄由本埠各商家的汇划向埠际间 汇兑业务发展·····	(312)
钱庄力量的壮大·····	(312)
钱庄承汇公款·····	(314)
四、邮政局、铁路等现代通讯与交通工具的 建立使票号业务渐次减少·····	(316)
第六章 合组银行之失败与蔚丰商业银行·····	(323)
一、合组银行的舆论·····	(323)
二、合组银行之过程及其失败·····	(327)
三、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中的损失·····	(336)
四、搁浅中的票号·····	(349)
民国成立与汇通实业银行的酝酿·····	(350)
山西汇通实业银行的筹款措施·····	(352)

平遥帮合组银行的努力·····	(354)
蔚丰厚票号改组银行的成功·····	(355)
五、合组银行失败的原因与票号的衰落·····	(357)
第七章 票号的衰败及其历史地位 ·····	(359)
一、票号衰败的过程·····	(359)
二、日升昌搁浅与倒闭的情况·····	(361)
三、日升昌的清理与复业·····	(365)
日升昌的清理与复业·····	(365)
清理后值得说明的问题·····	(369)
四、票号衰败的原因·····	(371)
五、票号的历史地位·····	(376)
奠定了近代中国金融流通的基础·····	(376)
民间专营汇兑的首创者·····	(376)
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	(377)
近代中国银行的先导·····	(378)
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380)
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381)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383)
六、票号的局限性·····	(384)
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体制·····	(384)
资本微弱与无限责任制的矛盾·····	(385)
学徒制度上的封建性·····	(385)

引 言

当您漫步在晋中平原，看到那满是垛落的封闭式的平遥古城时，您不会想到这里曾是上一个世纪的中国金融调拨中心——山西票号的发祥地。当您漫步于平遥的古城墙上，面向东北眺望晋中大地时，看到的仅是那既无特产以为凭藉、又缺乏矿藏资源的平、祁、太三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上一个世纪中，这里曾先后崛起过 30 余家票号，在国内外 110 多个城镇码头遍设 480 个分号，成千上万，不，甚至是成百万、成千万地为全国各地的商埠、码头以及日本、朝鲜、印度等国调拨银两，调剂余缺，被称为“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的汇兑庄。这些票号又是靠什么法术做到了：“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既便于工商业的发展，又曾为当时的皇家财政服务，其声名显赫，势倾中外，留百代不替之佳话，传万世利国、利民又利己之余韵，正如时人所称颂的那样“汇兑一庄。业于四海之内。润身乎济，利用通缓急，达人情；约之则摄于毫厘，扩之则弥于六合，相机筹划，变运无穷，是其大概情形也。其所以深谋远虑而无毫发之滞碍者，是又在得其人以为之焉耳。夫理财犹用兵也。岳武穆之以少为多，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淮阴侯之多多益善，其统摄之法，周乎万变。此二者，皆善用兵者也；汇兑之设，亦犹夫是。

汇者，归一也；兑者，两平也。其中之接济流通，无满无溢。一纸之文凭甫寄，万事之举措咸宜，虽则迢迢千里外，亦犹方寸咫尺间。转运通而接济有方，库储充而度支自裕。左宜右有，以逸代劳，是大有裨益于国计民生者，岂与寻常商贾可比哉？吾闻深藏若虚，良贾之图维綦慎。而汇兑者有形无形之经画，或隐或

现之机宜，声气之相感，乡音之互通，诚能审其致力之所在。斯位置不敢自卑，不然骄慢成习，锱铢必较，返心何堪自问乎？夫益己莫先于利人。苟能以天下之财为财，是汇兑即所以利于天下也。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诚足为天下之良图……”。^①

另外，还有人为票号写过一幅对联，对票号的作用，描绘的亦颇贴切。其文曰：

障百川而东之，九府流泉资利赖。

是通国所宝也，三官平准试经纶。^②

票号之所以如此为人们所称道，靠的就是两个法宝：一个是“利己必先利人”；一个是笃诚信行。前者是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它使精神可以变物质；后者是传统文化的辩证法，它使事业可以垂诸久远绵长。平遥人在上一个世纪创造了票号这个金融业的怪物，使对立的双方统一于一体。做到了既利国利民，又利己，使三晋这块黄土地，在近代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为全国工商界所仰赖，为世界各国所瞩目。

现在就让我们从票号的诞生说起罢。

① 石生泉：《平遥票号史》（未刊稿）收存之张旭东：《汇兑记》，光绪四年。

② 百川通票号木刻对联，存平遥城内南大街134号，百川通旧址。

第一章 山西票号的诞生

票号是19世纪初民间创办的为工商业者从事埠际间货币汇兑的专业金融信用机构。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必然地与当时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进出口贸易、城镇发展、金融业状况以及交通运输等相联系，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又与当时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程度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紧密相关。为此，在叙述票号诞生之前，首先，要把上述情况作个交代。

一、票号诞生前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明清两代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生产的政策措施

19世纪初，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嘉庆皇帝统治的时期，其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滚瓜烂熟的程度了。尽管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仍然是封建经济，但是，它和以前的封建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它的内部孕育着自明代中叶以来就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萌芽性的资本主义因素，以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于当时某些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部门，诸如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以及商业资本的活动中。在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这种破土而出的萌芽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腐蚀和瓦解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之趋向于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明政府所以在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颁布一条鞭法，正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所使然。

明初，革除元代弊政，对于手工业者的匠户实行轮班制度，手

工业者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为封建国家服役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它较之元代部分工匠被终年拘留在官营手工作坊内从事劳作，无疑是一次解放。嘉靖年间，明政府开始在部分地区推行经济改革，把原按户论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将夏秋两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这就是后来在万历年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与此同时，嘉靖八（1529）年明政府又正式下令废除轮班制，一律改为“班匠银”，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役。尽管元代以来的“匠籍制度”没有废除，但手工工匠们从此与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也得以减轻，甚至出现了“操技术以食于民者，曾不供一王之役。”^①的情况。工匠们的技术和产品可以更多地投向市场，这就有利于进行商品生产，从而有利于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清以后，顺治二（1645）年五月十九日上谕明确宣布废除匠籍制度，“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免征京班匠作”，手工业匠籍身份的解放，从此获得了法令的保证。另外，清政府为了避免农村人口的隐瞒和流散，稳定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除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收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外，又于康熙五十（1712）年提出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时清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1711）年固定的丁银（人丁2,462万，丁银335万余两）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从明代开始的这一赋税制度的改革，至此，就算完成。丁银完全随粮起征，数千年来的丁税，基本上废除了，这不仅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更使“手艺贫民受益良多。”^②从此，封建国家对农民手工业者的束缚大大削弱，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货币经济较前迅速地

^① 王夫之《噩梦》。

^② 倪师孟：《重刊乾隆震泽县志》第10卷，第10页。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393页。

发展起来。

与赋役制度改革和工匠制度改革的同时，明清两代在手工业和工矿业发展等方面都作过一些改革，或较多地放松其控制。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对于一些手工业和重要的工矿业，一向控制极严。明清两代在这方面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明显放松的趋势。比如铁矿的开采与冶炼，历来为政府所官办。明初除官办铁矿和炼铁业而外，许民间开矿炼铁，这方面虽无统计，但知从永乐到宣德30多年间民营铁矿的铁课，从79,806斤增加到555,260斤，增长了7倍。有人还估计明代宣德时，民营铁矿大概年产800万斤^①。清朝入关后，鉴于明代“矿税之害，矿徒之扰”，因而对开矿十分慎重，康熙十四（1675）年，“定各省开采铜、铅，抽税十之二”。至于铁矿，本着已开之矿，继续开采，未开之矿，“仍行严禁”^②的精神，允许商民投资于原已开采之矿。雍正八（1730）年又在“百姓自采以供农器，间往邻邑售卖”的前提下“听商民自便”。政府征收铁课，“十分抽二”。乾嘉时，更允许铁厂产品自由买卖，甚至将赋税由征铁改为征收货币^③。对于煤矿，清政府规定只要在“无关城池龙脉及古今圣贤帝王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住所”的前提下，“悉听民间自行开采”^④或“照例招商开采”^⑤。

盐税为封建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为此，盐业生产和铁一样，历来官办。但自明清以来，部分地发生了变化，其中井盐的变化尤为明显。“明以前井灶多由官办，后虽改招灶户，然仍设官监之。自清初则任民自由开凿，遂为人民之私产。国家只就井灶而征以

① 《明代矿业的发展》。见白寿彝：《学步集》“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② 王庆云：《石渠余记》，第227—228页。

③ 王庆云：《石渠余记》第225页。

④ 清代钞档，转引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319页。

⑤ 《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206页。